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 維護學術名義暨國家利益

齊塔連柯*著 陳相因、陳志豪**譯

俄羅斯科學院的五十週年院慶，這不僅是一大盛事，此活動現階段的首要之務更在於有一嚴肅機會，來理解過去走過的道路，並確立未來的新目標。遠東研究所主要是從事研究的機構，旨在觀察與歸納所有遠東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經驗，並且和俄羅斯政府在政治上具有連帶學術關係的東向發展息息相關。當中尤為首要者，在於與偉大的鄰國中國的關係上，科學院半百週年紀念這一活動的見證，全然是回應這一概念。

在這一紀念日裏可以回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起源。如以非正式性地詳列年表來回顧這四十年來的歷史，溯及自一九六六年，也就是遠東研究所成立後第十年。在一九五六年十月根據蘇聯科學院主席團第五七一項決議成立了漢學研究所，其目的在提供研究的方向與籌備下列學術成果，以提供有關政府的、經濟的、文化建設等問題的解答，這些問題裏亦包含了歷史、語言、文學以及與中國的國際關係。然而，在一九六〇年漢學研究所卻基於非學術科學的理由而被關閉。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漢學研究所實質上才以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名稱重新開張。

儘管如此，今天若忽略不談漢學研究所而只論遠東研究所，就會是一個嚴重的疏失。在遠東研究所剛成立的前幾年，儘管每一個組織的成長有許多必然的難處，

本稿為 2006 年俄羅斯科學院建院五十週年慶紀念活動上的演講稿，在此感謝齊塔連柯院士賜稿。俄文部分沿用原文體例。

* 齊塔連柯(М. Л. Тигаренко)，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現職為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

** 陳相因，本所助研究員。陳志豪，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生。

但它有優越的基礎得以憑藉，而這些基礎便是前人留下的豐富堅實的學術與智識遺產，還有俄羅斯與蘇聯時期東方學的成果，當中尤以漢學研究所傳承下來的學派、經驗與成果最為重要。

有不少傑出的學者在祖國學術史上留名。他們的學術活動、生活思想與著作都奉獻在遠東國家社會經濟與文明發展的歷史與經驗之全面性研究，並將學術研究實際應用於俄羅斯對遠東地區的政策擬定。俄羅斯在中國的傳教士團(1715-1954)出版的著作與手稿裏所傳下的豐富學術遺產，乃是我國漢學研究的搖籃。這些著作與手稿的作者有當時傳教士團的一群領導人，也是國內漢學界巨擘如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卡伐洛夫(П. И. Кафаров)、喀緬斯基(П. И. Каменский)；同時也有傳教士團裏的成員——神職人員及一般民眾，如羅梭辛(И. К. Россохин)、列翁切夫(А. Л. Леонтьев)、立波夫茨夫(С. В. Липовцев)、列翁切夫斯基(З. Ф. Леонтьевский)、斯卡奇科夫(К. А. Скачков)等。

俄羅斯首位漢學家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院士創立了這一傳教士團學派。俄羅斯傳教士團在中國研究這一領域的貢獻將俄國漢學帶向世界性的學術水準。這一主題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由契訶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伊凡諾夫(П. М. Иванов)、伊帕托娃(А. С. Ипатова)、瑪洛斯(И. Т. Мороз)、米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彼斯科夫(Г. Н. Пескова)、帕茲涅夫(Д. Поздняев)等人合著的《俄國傳教使團在中國的歷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一書中有一系列的相關論文。我國漢學研究的傳統不僅吸收了大量的知識性與研究性的資料，同時也領悟精神上的意涵，並洞察中國這位鄰居偉大文明的神祕，這樣的傳統在蘇聯時期也得以維繫。這些活動家群組而成的學術著作，如兩位院士阿理克(或音譯為阿里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與康拉德(Н. И. Конрад)、俄羅斯科學院通訊研究員費多連科(Н. Т. Федоренко)、松切夫(В. М. Солнцев)，與阿司塔斐耶夫教授(Г. В. Астафьев)、貝留茲寧(Л. А. Березный)、維特金(Р. В. Вяткин)、德拉古諾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艾菲莫夫(Г. В. Ефимов)、喀拉克羅夫(В. С. Колоколов)、克里夫佐夫(В. А. Кривцов)、柯涅爾(Н. В. Кюнер)、龐可拉托夫(Б. И. Панкратов)、兩位彼得羅夫(А. А. Петров 和 В. В. Петров)、培雷維泰羅(А. С. Перевертайло)、波茲涅娃(Л. Д. Позднева)、西蒙諾夫斯卡婭(Л. В. Симоновская)、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艾德林(Л. З. Эйдин)、艾倫堡(Г. Б. Эренбург)、尤里耶夫(М. Ф. Юрьев)，以及遠東所第一任所長，也是蘇聯科學院通訊研究員斯拉德喀夫斯基(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還有其他多人的研究，對這些傳統的長遠發展的貢獻無庸置疑，也為俄國當代與新一代的漢學家奠定了成功的基礎。

對俄國另一個遠東鄰國日本的歷史與文化研究，亦與赴日的東正教傳教士團活動相關，其主要運作方式是和傑出的宗教活動家，也是學識淵博的神職人員、日本學在俄國的創始者與長年領導人尼古拉·喀薩特金 (Николай Касаткин) 的學術著作連結在一起。尼古拉身為日本學的熱心傳播使徒，故又以伊朋斯基 (Японский)¹ 為姓而為人所熟知。

自一九九六年的四十週年紀念至今不過短短的十年光景，在當年還曾發行過詳細的圖書書目分類，並概述遠東所著作成果的指南手冊，儘管過去這些年對俄國學術界而言並非最好的時光，但遠東所在學術與學科應用上仍發生了許多重要大事的轉變。正是這些轉變確立了研究團隊今天的地位、其重點研究方向、學術目標、成就與問題，因此，每逢週年紀念都值得我們特別留意。

如果以一種枯燥而官僚的語言來說（在紀念日裏又免不了得用這樣的語言），遠東研究所遵循其自己基本調配的任務，在研究東北亞個別國家：中國、日本、南北韓等國之議題，和亞太地區的共同問題；持續地在傳統的框架下從事學術活動的方向。而這些方向又以上述地區的經濟、歷史、政治及文化問題之基礎與應用性研究為主，並且配合這些基礎支持來維護俄羅斯的國家政府利益。

由此概念的成果可見，遠東研究的意涵不僅在於學術，更具嚴肅的實用意義。目前遠東所與總統府，以及俄羅斯聯邦政府、國會，以及俄羅斯聯邦議會聯邦院等機構，還有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各主管機關，以及遠東地區的行政機關都維繫著密切的合作關係，這並不是件令人意外的事。遠東所為這些機關提供研究成果，完成儲備資料的資訊分析的工作，並針對不同的問題給予實際上的建議。

遠東研究所藉由現代科學儀器來進行研究活動，所內的學者們都精通兩種以上的東西方語言，並積極地在自己的工作上加以應用。學者們也運用電算科技（個人電腦），這些有的是遠東所在推展學術合作計畫時所購置的，也有受俄羅斯科學院人文科學基金會的補助而添購的。遠東所的研究被公認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由

¹ 譯者注：伊朋斯基這一俄國姓氏可意譯為「日本的」，故其姓名之意可譯為「日本的尼古拉」。

兩位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三十二位教授與博士、六十六位副博士，在漢學、日本學與韓國學領域所領導的研究成果非常符合學術知識的現狀，在許多方面蔚為先驅。

遠東所近幾年的研究都是依據著科學院的計畫架構在進行，其中包括研究計畫〈20-21世紀之際世界進程裏的俄羅斯與東亞〉(Росси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в мировых процессах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以及俄羅斯科學院跨學科部門的〈全球化世界裏的俄羅斯〉(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изирующемся мире) 和俄羅斯人文科學基金會的〈當代世界的俄羅斯面貌〉(Образ Росс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等研究計畫。如果使用最普遍的歸類法，依主題結合與俄羅斯利益相關者，可將研究括分為兩個主要的方向：一、國家區域內的發展與改革等內部面向。二、維持東北亞地區穩定、安全與經濟成長的國際性因素之探討。

在對上述整體研究方針概括評論的同時，也必須強調從內部問題的觀點來研究在過去與現在都備受重視的中國、南韓與日本的社會和經濟改革經驗。依據這樣經驗的運用提出相關的結論和建議，在這些實際經驗裏，有部分包括在過渡期顯示出政府的控制作用較高，突顯對國營企業的援助問題，與對本土製造業的維護，以及對民眾的社會保護措施全面地深入研究，使其免受不成熟市場機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在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利益，及俄羅斯聯邦與亞太地區經濟的整合上，遠東研究所詳細分析了與遠東各鄰國商務合作的發展理念。擬定長期的移民政策來吸引中央地區的人民，甚至是將獨立國協中不安定地區的難民遷徙至遠東地區，使其安居於此。

從研究國際面向的觀點論之，遠東所實際上參與了國家安全與對外政治的政策研究。綜合性分析文件的完備，可用以評估俄羅斯聯邦在亞太地區的國家防禦中所面臨的挑戰與威脅。學者們由此推測，在亞太地區，特別是東北亞之間交流過程晦深莫測，且莫衷一是，其特徵在於合作與武力競爭兩相矛盾的多重組合要素，伴隨著最新利益的驅力增強。這也構成了東北亞地區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進程。此地貫穿了俄國、中國、美國與日本的國家政府利益，在此連結裏，遠東研究所對其中一部分提出看法：要在亞洲成立軍事政治架構，連結北約組織，需要維持並增強俄國軍事潛力，以及宣示俄羅斯聯邦海軍在太平洋的勢力。

印度和東南亞國家聯盟在亞太地區防禦概念〔等政策〕的制訂上，開始有著越來越顯著的影響力。這正是為什麼俄國和中國、印度、越南間，發展友好的合作伙

伴關係，並相互配合對方策略，特別在克制美國、日本和北約組織等國霸權主義與政策衝突的脈絡下，對亞太地區及東北亞的情況有著正面的影響。形成這些關係的基礎概念尤為令人矚目，其中重要的是平等且出於信賴的伙伴關係，並具戰略的相互配合，以求共同的發展。

整體而言，遠東研究所實行關於提高俄羅斯在亞洲建立防禦系統的角色這一堅定思想，將之奠基於互蒙其利的多重原則上，以維護俄羅斯主權與領土完整，並鞏固它在國際上的地位。同時我們也可發現，遠東所是研究俄羅斯與那些在亞太經合會與東盟區域會議框架下的國家，在拓展各種問題合作上的基礎科學機構。

解決上述那些緊密連結著這些國家內部與國際關係問題的研究課題，其方法的特性在於運用已退休外交人員與國情學家的豐富經驗，因為他們對於亞洲國家有著深厚的了解。遠東研究所曾發行過許多外交人員和東方學學者的回憶錄，當中包含了我國和日本、中國、韓國之間關係研究上相當具有價值的資訊。一九九六年出版契訶文斯基的《俄羅斯與日本：註定的睦鄰關係》(Россия-Япония: обречены н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о) 和二〇〇四年的《重返天堂之門》(Возвращение к Воротам Небесного Спокойствия)，一九九九年拉赫瑪寧(О. Б. Рахманин)的《論蘇俄、蘇聯、俄羅斯聯邦與中國的外交史 1917-1997》(К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РСФСР, СССР, РФ с Китаем, 1917-1997)，以及里多夫斯基(А. М. Ледовский)的《蘇聯和史達林在中國》(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二〇〇五年出版《蘇聯、美國與中國革命的見證者：從 1946 到 1949 年》(СССР, США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 1946-1949)，維列夏金(Б. Н. Верещагин)在一九九九年的《新舊中國》(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二〇〇三年出版克魯契科夫(К. А. Крутиков)的《派遣中國：外交官的回憶錄》(На китай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二〇〇五年羅加契夫(И. А. Рогачев)的《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中俄關係》(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конце XX -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等。並邀請軍事政治工作者布寧(В. Н. Бунин)、伯烈科(А. В. Болятко)、喀緬諾夫(П. Б. Каменнов)等人提供研究亞洲軍事防禦問題的資訊。這些學術著作與實務工作者促使遠東所能結合基礎與理論的詳盡分析，兼具了鞏固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國際地位與國內安全的實際問題。

近十年來，遠東所學者的研究集中於下列幾項最為迫切的議題與學術方向。第一，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與區域化的世界進程裏，俄羅斯與中國如何進行改革。第

二，多元化世界的形成與俄羅斯對東亞安全的考量評估。第三，二十一世紀的俄羅斯與亞太地區：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過程。第四，東亞國家社會政治與經濟發展的總體分析和診斷預測。第五，亞太地區的文明關係。最後，「上海合作組織」與區域安全問題。

在過去十年裏，遠東所研究人員的專題著作、論文、報告和其他學術著作中，都反映了這些學術成果，其中幾篇著作值得更深入討論。論國際關係問題的一系列研究裏，院士契訶文斯基的著作占有特殊地位，其研究內容包括過去一世紀以來，世界重要趨勢發展的分析。在二〇〇五年出版的《瞬息萬變的世紀》(Век стремительных перемен)一書中，作者注意到，生產力、科學與技術的急遽成長伴隨而來的現象如下：工業化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發展的步調與水平有著嚴重的落差、全球人口加速增長、戰爭的普遍性、前所未見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各國國內革命事件頻仍，以及為了人類能穩定發展的種種試驗。作者分析了二十世紀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別關注國際關係史與外交史、中日兩國的歷史、歷史學的發展。該書中亦包含了作者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室中所發現的，在過去所不為人知的中蘇關係歷史的文件。

在二〇〇三年出版的專題著作《俄羅斯由合作到安全：東亞指標》(Росс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через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ий вектор)一書中也詳細地檢視了俄國擴張與中國、日本、南北韓以及印度間，在相互交流之下所產生的綜合問題。尤其備受重視的是，在為加速發展西伯利亞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目的下，與上述這些國家合作時所具備的潛力²。

另一部研究中國二十年來所進行的政治改革與現代化經驗的著作，探索的主題如下：伴隨中國長期發展的遠景所產生的機會和新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部政治上的內部進程的影響，以及未來中俄合作關係。《中國——俄羅斯 2050：共同發展策略》(Китай -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一書的作者群利用由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策略所的研究群所制訂出來的預測方法論，設置問題用以判定，在長期的動態進程裏，藉助由中國國內與國際發展穩定性所組成的九個層面來分析，中

²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Росс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через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ий вектор. М., 2003.

國因素對俄羅斯的意義³。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年之際，遠東所發行了重要著作：《從 1949 到 1999：中國邁向現代化與改革之路》(Китай на пут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реформ, 1949-1999)。本書就實質而言，在二十一世紀前夕呈現出嶄新的觀點：俄羅斯看中國與中國眼中的俄羅斯。其作者群為中俄雙方的學者與外交人員。本書包含中國如何尋找對抗落後的途徑的綜合分析、全方位現代化的轉變，以及如何成為一個具備現代經濟、科學和文化的繁榮國家。

二〇〇四年發行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 55 歲：政治、經濟、文化》(КНР 55 лет: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культура)。作者整合分析中國近二十五年來的經濟改革與政治開放。此書涉及層面相當廣闊，包含中國在全球化底下的外部經濟策略，並提及中國如何鞏固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書中並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超過半世紀以來，其內政與外交活動中的重大事件。

在俄國與海外首屈一指的漢學家通力合作之下，於二〇〇四年出版文集《文明對話裏的中國》(Китай в диалог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這是世界漢學界裏唯一一本以中國的歷史、政治、文化、哲學等不同觀點出發，並含括政治學說與道德觀念的著作，著重於分析中國當代社會的現狀，以及其對內與對外政策。

二〇〇二年亞可夫列夫 (А. Г. Яковлев) 發表論文集《俄國、中國與世界》(Россия, Китай и мир)，書中分析中俄雙方於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面臨的迫切的國際政治問題，並詳加審視歐亞與亞太地區政治發展的前景。

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六年間完成諸多鉅著，書中援引的文獻資料大多是首度應用於學術研究上；此外，這些著作更發掘中俄和中蘇關係史、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國共內戰（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等歷史中較罕為人知的史實，並研究中俄雙方當前的關係。

除此之外，俄羅斯人文科學基金會 (РГНФ) 資助《十七至二十世紀中俄關係互動》(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в XVII-XX вв.) 研究計畫，由契訶文斯基擔綱總編輯，米斯尼科夫 (В. С. Мясников) 擔任編輯，依序出版《十八至二十世紀中俄關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XX веках) 一系列的文獻書籍。

³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Китая: шансы и вызовы времени. М., 2000; Кузык Б.Н.,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Китай - 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 2006.

二〇〇〇年第四卷《中蘇關係 1937-1945》(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гг.)問世，該書根據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檔案室與總統檔案室的文獻資料編撰，絕大多數的資料先前都未曾曝光⁴。書中首度將史達林與中國領導人的書信運用於學術研究；更援引一九四五年中蘇談判文件的全文，當年的談判最後簽訂的條約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起生效。

此卷資料闡明，即便在二次大戰時期蘇聯衛國戰爭最為艱困的時刻，蘇聯仍然資助中國人民抗日的史實。此外，蘇聯在二次大戰中給予中國的並非僅有物質和科技的援助。從此卷中證據確鑿的文獻裏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強化中國社會全部力量來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上，蘇聯的外交政策扮演著正面的角色。此卷最後附上了史達林和蔣中正的兒子蔣經國的談話紀錄，證明蘇聯的確準備幫助中國建立一個統一的政權。

本系列第五卷同樣地以兩冊裝收錄文獻，說明從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間蘇聯和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發展、蘇聯政府和中共領導人之間的通訊、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交至一九五〇年二月間初始階段的外交關係⁵。

二〇〇四年發行了從一六八九至一九一六年間有關中俄關係的重要文件彙編。這是俄國學術界頭一次，依照從十七至二十世紀初的中俄兩國關係建立史與發展史兩方面來蒐集的官方文件大全。書中除了整理一系列已運用於學術研究的文獻之外，也含括之前未曾出版的大量檔案資料，不僅歷史學專家對此大感興趣，對於一般讀者亦具有莫大的吸引力⁶。

在遠東所週年紀念的這一年，出版了第三卷關於十八世紀中俄外交史，探討始於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條約」(Нерч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簽訂以來，直至一七二八年「布連斯奇界約」(Бур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和「恰克圖界約」(Кяхт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簽

⁴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4.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В 2 кн. / Сост. Д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М., 2000.

⁵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 - февр.1950: В 2 кн. / Сост.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М., 2005.

⁶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ые акты (1689-1916) / Сост. Мороз И.Т., Мясников В.С.; Общ. ред. Мясникова В.С. М., 2004.

訂為止，這一連串中俄國界逐漸成形的過程與事件⁷。

這一系列的文獻書籍具高度的學術水準，每一卷都有歷史和古文獻的介紹、完備的註解附錄、人名簡介和地名索引，以及專有名詞辭典。總共出版了八卷，其中兩卷又分為上下冊。這樣的出版品史無前例，即便全世界的歷史學界也找不到類似的作法，因此能在俄國和海外引起廣大的迴響並不令人意外，關於此點已有不少的評論文章作為見證，甚至有個別單卷已在中國發行中文譯本。目前，一個「俄羅斯——中國研究中心」的小組成員持續著力於編著最新的文獻卷，其中包括厄爾切米耶娃(О. С. Артемьева)、伊帕托娃(А. С. Ипатова)、杰多夫斯基、米羅維茨卡婭、馬洛斯(И. Т. Мороз)、薩爾奇索夫(Г. И. Саркисова)、圖爾恰克(Т. М. Турчак)等人，並由俄羅斯科學院兩院士契訶文斯基和米斯尼科夫指揮統籌。

已發行的諸多論著旨在研究中蘇與中俄關係。絕大多數參考並援引米斯尼科夫於一九九六年出版的《由條約確立國界：十七至二十世紀中俄國界外交史》(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XVII-XX вв.)，該書於一九九七年由赫巴羅夫斯克出版社(Хабаровск)再版發行，以及米羅維茨卡婭於一九九九年出版的《1941-1945 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的政體與蘇聯在中國的政策》(Кита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Китае: годы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二〇〇〇年庫立克(Б. Т. Кулик)在專書《中蘇交惡的起因與影響》(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中，真實地呈現二十世紀最不容忽視的國際大事之一，可惜該事件仍罕見研究。作者首度大量地應用解密文件，不僅描繪一齣歷史戲碼，深入分析中蘇內政，進而指出該事件的濫觴與主要的催化因素。

彼斯科夫(Ю. С. Песков)於二〇〇二年出版《1976-1991 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從衝突到合作》(СССР - КНР: от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к партнерству, 1976-1991)，作者在書中分析中蘇關係的艱困時期。此外，冷戰後期國際情勢緊張；毛澤東逝世後，文化大革命告終，中國當局始制訂新的政治方針。同時，蘇聯內部和各國的社會主義體制又面臨一觸即發的巨變。在這種種因素之下，雙方關係如何漸趨正常也

⁷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3. 1727-1729 / Сост. Мясников В.С., Тарасова А.И. М., 2006.

是該書探討的主旨。

書中也研究二十一世紀初中俄關係的情勢與特點，尤其著墨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與可能的情況，以及影響中俄關係的主要國際因素；分析雙方政治、經貿往來等問題，並探究全球化之下，文化之間如何對話。此外，也提出許多能有效提升中俄關係的實際方法、研究當前中俄合作的主要方向、強調中俄經貿往來的重要性，以及能否利用良好的雙邊關係進入東亞與東南亞市場。該書特別留意國際合作之於遠東與西伯利亞的經濟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並建議積極推動中俄雙方的經貿發展。

遠東所也持續研究中國國界政策和中俄與中蘇劃定國界的歷史⁸。其理論與歷史研究對於俄國外交單位在解決俄國與哈薩克、吉爾吉斯、中國和北韓的國界劃分問題上有著極大的幫助。諸多論著亦闡述該研究成果⁹。

二〇〇一年出版的專題論文《中國國界成形史》(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是由米斯尼科夫和斯切潘諾夫(Е. Д. Степанов) 共同主編，由波科夏寧(А. А. Бокщанин)、瓦寧(Ю. В. Ванин)、沃斯克列辛斯基、加列諾維奇、婕米朵娃(Н. Ф. Демидова)、馬洛斯、姆拉雪娃(Г. Ф. Мурашова)、米斯尼科夫、帕夫廖千科(В. Н. Павлятенко)、彼斯科夫、斯切潘諾夫、劭緬(Т. Л. Шаумян)、雪蓓蕾娃(Н. В. Шепелева) 等作者共同編著。這是俄羅斯學術界首次發表，針對中國領土的演變、形成、確立到簽署條約的綜合研究。研究基礎主要是依據中國國界事務的相關文件與檔案資料。這些專書著作已成為研究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重要貢獻。斯

⁸ 原文作者使用粗黑斜體強調重點，本譯文依照中文慣例格式表達。下文重覆處不再贅述。

⁹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Д.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1881 года. М., 1995; Он же.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теория и история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 1999; Галенович Ю.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 граница. М., 2001; Кузык Б.Н.,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Кнтай-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 2006; Мясников В.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Дипломат, история рус.-кит. границы в XVII-XX вв. М., 1996; Он же.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400 лет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Lewiston (N.Y.) etc., 2001;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стоян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Рук. проекта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М., 2005;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 Рук. проекта и авт. коллектива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М., 2005;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Росси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Вопросы междунар. и Меж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 1994; Он же. Россия лицом к Азии. М., 1998; Он же. Росс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через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ий вектор. М., 2003.

切潘諾夫的著作則有助於了解中國沿海國界的形成¹⁰。

一九九六年科學院院士契訶文斯基出版了極具價值的著作《從 1898 到 1949 中國的統一與獨立之路：根據周恩來傳記資料》(Путь Китая к объединению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1898-1949: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биографии Чжоу Эньляя)。書中以廣闊的歷史背景，以及大量的中文、俄文、英文及其他語言的文獻資料為基礎，綜合分析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以前的各階段革命與中國人民解放運動。

遠東所人員亦致力於一個歷史方向的深入研究，那就是中國革命與解放運動的歷史，學習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政治史，還有他們同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公開了許多檔案文件，顯著地提升了紀錄出版品裏的文獻來源基礎。遠東所繼續在一九九三年開始籌備出版的另一系列的文獻紀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德方的籌備人是郭恆鈺(Го Хэньюй)及劉特納(М. Лейтнер)，俄方則是齊塔連柯。遠東所的主要幾位學者如格魯寧(В. И. Глунин)、格利格里耶夫(А. М. Григорьев)、梅爾妮可娃(Н. И. Мельникова)、索特妮可娃(И. Н. Сотникова)、雪維列夫(К. В. Шевелев)皆參與此出版計畫。此系列著作的第一卷與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班共同籌備，根據編年順序記錄了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年的史事，並於一九九四年在莫斯科發行俄文本、一九九六年在柏林發行德文本¹¹。

一九九六年發行文獻彙編第二卷《1926-1927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¹²，一九九九年出版第三卷，詳述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間的史實¹³。如同先前兩卷，

¹⁰ Степанов Е.Д. Китай на морских рубежах. М., 1994. (ИБ; № 4); Он же. Правовые аспекты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х споров в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ре. М., 1997. (ИМ. МО; Вып. 3); Он же.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е море: острова на материковой отмели // ПДВ. 2006. № 2. С. 55-70.

¹¹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1920-1925 / Рук. работы: Го Хэньюй (с нем. стороны), М.Л. Титаренко (с рос. стороны). М., 1994. То же: Пер. на кит. яз. Пекин, 1997. То же: Тайбэй, 1997. То же: Пер. на нем. яз. Paderborn etc., 1996.

¹² То же. Т. 2. 1926-1927: В 2 ч. / Рук.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с рос. стороны), Лейтнер М. (с нем. стороны). М., 1996. То же: Пер. на кит. яз. Пекин, 1998. То же: Пер. на нем. яз. Minister, 1998.

¹³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3.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27-1931: В 2 ч. / Рук. работы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с рос. стороны), Лейтнер М. (с нем. стороны) М., 1999. То же: Пер. на кит. яз. Пекин, 2002. То же: Пер. на нем. яз. Munster, 2000.

不管就其內容的原創性程度或是文獻重要性來看，在俄羅斯國內外相關研究領域的出版品中都是絕無僅有的。已出版的三卷彙編之序言和導論中，皆指出了針對這個重要研究趨勢的新途徑，並首度揭露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在中國的行動（其內部成員以及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政策執行時所扮演的角色。如同前兩卷，第三卷也附上人名的註解，讓許多先前派駐在中國的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不會再被歷史遺忘。

二〇〇三年出版第四卷：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的文獻資料。在這卷中頭一次引用涉及蘇維埃概念在中國演變的檔案紀錄，也提到自共產國際第七次會議（在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召開）後，中國共產黨決定將中國的蘇維埃化政策趨向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概念¹⁴。本卷總共分為四冊，共計出版了一七六六份取自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與共產國際中國辦事處等處的文獻紀錄，其中絕大多數是首次應用於學術研究。現下第五冊的編纂已在籌備當中。

這個研究趨向發展的特性是，以此文獻資料為基礎的專書著作反映了「共產國際學」新的學術水準。馬瑪耶娃（Н. Л. Мамаева）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著作《1919-1929 共產國際與國民黨》（Коминтерн и Гоминьдан, 1919-1929）裏，闡述一個罕被研究的主題——國際共產運動與孫中山的國民黨之間的互動。在這本著作裏國民黨被視為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國人民解放運動的政治主力，而孫中山和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則是國家統一的重要出發點。卡爾杜諾娃（А. И. Каргунова）在根據新的檔案文獻所寫的著作中，仔細地研究了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俄共（布）／聯共（布）與共產國際的軍事政治層面，從理論研究到中國人民解放運動中實際應用的各種方法¹⁵。

在分析影響保障俄羅斯聯邦在亞太地區的國家利益等因素的框架下，其中包含在此地區經濟合作的可能性等，準備的研究工作亦涵蓋關於俄羅斯必須積極地參與國際計畫，像是圖們江經濟特區計畫、建立洲際鐵路路線——「新絲路」的迫切性、關於在區域政治問題脈絡下的俄羅斯利益、與遠東鄰國在各方面發展的交流，如與

¹⁴ То же. Т. 4.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31-1937: В 2 ч. М., 2003.

¹⁵ Коршунова А.И. 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в Китае: Воен. аспект (1923 - июль 1927 г.). М., 2000. То же.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2001.

中國、日本、南北韓及臺灣間存在著能源、貿易、投資、勞力等範圍的大量合作的遠景，在這條（合作的）道路上如何消解種種問題的方法已在實際探討問題的專著進行論述¹⁶。

在特性分析與全球化的矛盾過程和亞太地區區域化的框架中，遠東所的學者十分重視此區域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在對政治領域、經濟、安全合作的關鍵問題上立場的發展和雷同之處。尤為重要的是，在舉證歷歷的情形裏得出一個結論：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與亞洲區域主義兩者對俄羅斯而言是很嚴重的威脅。若無理性且能奏效的政策因應上述複雜問題，俄羅斯不僅很難在亞太地區的經濟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將不易有效解決內部經濟發展的問題。

近幾年有一系列研究特別專注於保障亞太地區安全，同時兼具俄國利益考量的不同觀點。研究中詳盡地分析了區域安全制度、亞太地區主導國（美國、中國、日本）的軍事政策、俄羅斯安全先後順序評估等問題，闡述在關係緊張的核心區域（朝鮮半島、臺灣海峽、日本周邊領海、其他島嶼和海域、恐怖主義組織可能的盤據地）的主要情勢發展趨向，詳細檢視俄羅斯如何選擇最佳策略，以及如何與遠東鄰國互動，其中包括軍事政治與軍事編制，根據這些研究做出建議與建言的評析¹⁷。

就中亞地區的安全問題，以及鞏固俄國於此區的國家利益等觀點而論，「上海合作組織」的角色與地位在學術優先順序上占有一席之地。針對上述議題，學者們特別著重於研究美國軍事力量界入此區的因素，以及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之下，中俄互動的特殊問題。在一些論著中也有涉及「上海合作組織」的議題，書中

¹⁶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о странами региона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96;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Россия лицом к Азии. М., 1998;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в АТР: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азвитие. М., 1998. (ИБ; № 6); Россия и АТР: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азвитие: [Сб. ст.: В 3 вып.]. М., 2001-2003;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 Рук. проекта и авт. коллектива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М., 2005.

¹⁷ Петровский В.Е.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е режи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эволюци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частия. М., 1998; Вызовы и угрозы Росси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 Рук. проекта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Болятко А.В. М., 2001; Военные аспект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М., 2001; Болятко А.В.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 поиска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Пробл. нац.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на Дал. Востоке и стратег.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М., 2003.

審視俄國、印度與中國之間的三邊合作發展；分析三方合作對於區域與全球所形成的正向角色，並指出三方合作在政治、經濟、學術與文化等領域上的美好遠景。此外，現階段的中美與中印關係、臺灣問題的實際面向與中國外部經濟的策略都是遠東所學者們長久以來所關注的焦點¹⁸。

每年發行的論文集《國際政治與區域政治裏的中國》(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¹⁹ 中的研究成果有助於審視中國的對外政策。該文集研究一系列的專業問題，其中包括亞太地區航海法的遵守，以及此區各國政府合作以維護海域的法治與秩序，並提出諸多建議以維護俄國在此區域的利益，例如強化俄國重建海上勢力的方略²⁰。文集中研究「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金融危機」的原因，及其如何影響東亞國家及俄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呈現出東方精神價值在克服此困境時所扮演的角色。根據該研究基礎所做的諸多建議皆反映在當時俄國政府的實際政策上，其中包括改變俄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間關係的策略。當中亦分析中國軍事學說的觀點，與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其軍事建設的走向；並且指出中國在軍事經費支出的趨向、軍備的現代化，以及該國學術研究和科技資訊的基礎。

中國解放軍透過逐步刪減軍隊人數與適度的軍事支出，將注意力聚焦於達到高品質的防禦能力，其最終目的在於建立軍力相對簡練而又裝備優良的部隊，並能在新的歷史環境中保衛國家。這也指出與外國，特別是俄羅斯，在軍事科技合作上對於中國完成防禦體系現代化的意義。目前已有刊物與學報分析論述該議題。

更有諸多重要的論著研究日本，甚至是韓國。日本研究中心日本部門自一九九二

¹⁸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Сост. Клименко А.Ф.; Отв. ред. Болятко А.В. М., 2005;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ндии и Китая в XXI веке: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Материалы трехсторонней конф. ученых России, Индии и КНР]: В 2 т. / Сост. и авт. предисл. Уянаев С.В. М., 2004;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Отв. ред. Кулик Б.Т.; Сост. Сафронова Е.И. М., 2004; То же. М., 2005.

¹⁹ 2004年主編依序為亞可夫列夫、庫立克(Б. Т. Кулик)，薩芙蘿諾娃(Е. И. Сафронова)為編者。後者自2006年起為主編。

²⁰ Агафонов Г.Д. Правовые аспекты проблем мореплавания в АТР и их влияние на мор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М., 2004;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АТР и мор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на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 Агафонов Г.Д., Болятко А.В., Васильев Л.Е., Клименко А.Ф. М., 2005.

年成立以來，由俄國成就斐然的知名學者彼得羅夫 (Д. В. Петров) 領導，在日本學研究領域完成數個大型學術計畫，解決許多日本對內與對外政策的根本問題。早期研究計畫中有一本集體編撰的專書《日本與國際社會》(Япония и миров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由蘇聯時期以來成就極高，並且在俄國東方學界亦為箇中翹楚的波司比羅夫 (Б. В. Поспелов) 主導，布寧、喀茲羅夫 (А. А. Козлов)、彼得羅夫、波司比羅夫、齊塔連柯²¹ 等學者通力完成。書中詳盡研究日本與西方文化交互作用的機制，分析影響日本國際化速度與影響範圍的意識型態和社會心理因素，並檢視日本人如何看待其他國家與異國文化。

一九九五年出版了兩本專書，分別為布寧、格里紐克 (В. А. Гринюк)、季莫寧 (В. П. Зимонин)、彼得羅夫、波司比羅夫、西敏 (А. В. Семин)、謝納托洛夫 (А. И. Сенаторов)、茨維托娃 (И. А. Цветова) 合著的《日本政治體制的演變》(Эволю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Японии)，以及布寧、彼得羅夫、波司比羅夫合著的《日本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經驗》(Опыт Японии в решени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書中同樣探討許多根本性的問題，諸如日本現代政治體制的形式、促使該體制發揮功效的方法、政治體制本身和社會意識的進展、個人在社會上與大眾意識下的問題等²²。這些議題一直是「日本研究中心」主要關注的學術焦點，因此在近幾年出版了諸多個人與集體著作的專書，深入研究日本政治結構與社會政策的議題²³。

在「日本與亞太地區安全問題」(Япон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АТР) 計畫下有多篇專題論文發表，內容涵蓋日本建構外交策略的主要觀點、日本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與地位、影響日本現代軍事策略與軍事政策的根本因素及趨向²⁴；此

²¹ Япония и миров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интер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 Науч. рук. проекта Поспелов Б.В.; Отв. ред. Петров Д.В. М., 1994.

²² Эволю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Японии / Науч. рук. проекта и отв. ред. Петров Д.В. М., 1995; Опыт Японии в решен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 Науч. рук. проекта Петров Д.В.; Ред. подгот. Бунин В.Н. М., 1995.

²³ Сенаторов А.И. Очерки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й реформы в Японии. М., 2004;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в Японии / Сост., пёр., авт. вступ. ст. Анисимцев Н.В. М., 2004; Цветова И.А. Эволюц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арти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Японии. М., 2002.

²⁴ Япон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АТР / Науч. рук. проекта и отв. ред. Бунин В.Н. М., 1996; Япония: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пороге XXI века / Науч. рук. проекта и отв. ред. Павлятенко В.Н. М., 2003.

外，亦探究日本與俄國、美國、中國，以及其他亞太地區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²⁵。

新的文獻資料確切地顯示蘇聯向日本宣戰前夕的地緣政治與策略情勢，並重新分析宣戰後的政治影響²⁶。同時，學者們也嘗試以亞太地區的當前局勢與發展趨勢為研究背景，說明俄國在這個世界上最活躍的地區的國家利益。「俄國——日本：尋求共識」(Россия-Япония: в поисках согласия)計畫旨在研究遏阻日俄關係發展的歷史因素。該研究特別著墨於如何解決千島群島的問題，並確立在拓展日俄經貿合作時，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所扮演的角色。此外，遠東研究所亦發行具分析性質的學報給俄國的行政與立法機關，提供對日關係的實際方針，以及改善雙邊關係的具體建議。有學者針對朝鮮半島上當前的政治局勢發展，以及俄國與南北韓的關係，對其影響因素進行綜合研究。例如自美國布希(George Bush)總統就任之後，兩韓對話非但不再熱絡，此區情勢反而更加緊張，對此現象學者們不僅提出緣由加以論述，更預測並建議俄國如何在不久的將來維護自身利益²⁷。

此外，學者們也分析北韓發展核武的狀況、主要利益關係國的立場，以及國際間致力於維護半島上無核武狀態所做的努力。他們並指出華盛頓當局對北韓的嚴厲態度致使緊張情勢惡化，韓國的鄰國反而支持俄國以外交手段介入調停，進而以此

²⁵ Семин А.В.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риентиры Японии и Китай (90-е гг.). М., 2001; Япо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Факторы стаби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 Науч. рук. проекта и отв. ред. Павлятенко В.Н. М., 2000; Бунин В.Н. Япон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союз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К 5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оздания). М., 2000;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Япония: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внешней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 Отв. ред. Павлятенко В.Н., Цветова И.А. М., 1998; Япония: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пороге XXI века / Науч. рук. и отв. ред. Павлятенко В.Н. М., 2003;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Японии: [Ежегод. сб. ст.] / Отв. ред. Павлятенко В.Н., Цветова И.А. М., 2001-2005.

²⁶ Зимонин В.П. Последний очаг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М., 2002; Он же. Победная точка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945 г. -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ход, итоги. М., 2005.

²⁷ Ткаченко В.П.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обстановки на Корей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и возможны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М., 1999; Россия и Корея в меняющемся мировом порядке / Отв. ред. Ткаченко В.П. М., 2003; Жебин А.З. О возможных сценариях развития ситуации на Корей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 Корей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и вызовы XXI века. М., 2003. С. 40-49; Савельев Р.В.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и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оекты на Корей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 Корея: новые горизонты. М., 2005. С. 189-200.

事件檢視南北韓政體與統治制度，以及當地社會、文化、法律、經濟領域的發展進程²⁸。

另一研究方向的主流則著重於社會經濟問題。因此，有一系列的綜合論著便以此導向為依據，論述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觀點。於是出現諸多詳盡的分析報告，指出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概念如何形成和演變、經濟體系的改革，以及一連串關鍵的經濟情勢如何轉變的特點。例如，採取總體經濟管理系統，利用財政經費推動的經濟特區與股票市場，並且歸納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討論能否將中國國家控制的經驗運用於俄國的社經條件之下，最後更評估中國往後可能的發展方案²⁹。

中國外部經濟策略的概念性問題亦為此方向的研究重點：說明如何以具體的形式將該策略實現於外貿、吸引外國資金、放寬「國土開放」等領域，並詳加審視中國外部經濟政策上的地緣優先順序，以及該政策對於各區域與全世界的不同觀點。由此可見中國在上述領域的經驗之於俄國，其意義同樣備受重視³⁰。

此外，在探討私有財產以及比較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等問題上，中國經濟學家的概念如何演變也是研究重點之一。學者研究中國如何學習並揉合外國的經濟概念之特點，分析中國經濟學自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末期至九〇年代中期的新方向³¹，並以

²⁸ *Корея в поисках мира и процветания: Докл., представл. на VIII конф. корееведов... / Отв. ред. Ткаченко В.П. М., 2004; Корея: новые горизонты: Докл., представл. на IX конф. корееведов... / Отв. ред. Жебин А.З. М., 2005; Суслика С. Экономик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орея в свете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М., 2002.*

²⁹ *Балюк М.А., Балюк И.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в КНР: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ынок. М., 1996; Сидихменов В.Я. Эволюци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о социализме в КНР (1953-1994). М., 1996; Пащенко Е.Г.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в КНР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право. М., 1997; Экономика КНР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XXI века (1991-2000 гг.). М., 1997. (ИБ; № 2); Ганшин Г.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в Китае: эволюция и реальные плоды. М., 1997; Бони Л.Д. Рынок в китайской деревне: В 2 ч. М., 1997. (ИБ; № 5, 6.); Круглое А.М. Сельские (поселкововолостны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в КНР: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в народн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 2 ч. М., 1997. (ИБ; № 7, 8); Портяков В.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итая в эпоху Дэн Сяопина. М., 1998.*

³⁰ *Потапов М.А.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итая: проблемы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М., 1998.*

³¹ *Борох О.Н.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М., 1998; Пивоварова Э.П. 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Итог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поиска. М., 1999; Виноградов А. Кита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поиски нов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 2005.*

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力作為切入點加以論述。

另有一類的著作意在預測至二〇一〇年、二〇二〇年，甚至是二〇三〇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並且整體分析各家論點，諸如各部門改革與結構改變的發展動向等，進而探討哪些因素促使中國轉型為已開發工業國，並逐漸邁向以「知識經濟」為主的後工業社會。同時，這些著作也探究為何經濟成長停滯不前，而提出的議題為何無法解決等問題³²。阿斯托洛夫斯基 (A. В. Островский) 在專書《中國勞力市場的形成》(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рынка рабочей силы в КНР) 中，審視此特殊經濟區塊中的發展動向，及其如何連帶改變國家社會架構與各階層的物質狀況³³。

遠東所自上個世紀九〇年代後期開始，著手進行幾項研究計畫。分別由俄羅斯聯邦財產基金會 (РФФИ) 補助的「中國經濟改革的社會評估」(Социальное измер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реформы в Китае)、俄羅斯國家學術基金會 (РГНФ) 補助的「中國的經濟改革」(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в КНР)、 「中俄社會經濟轉型過程的比較分析」(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процессо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КНР и России) 與「現代農村的土地改革與社會經濟改造：中國與臺灣經驗」(Аграрные реформы 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еревне: опыт КНР и Тайваня)。這些研究主要探討中國社會策略的基礎方向，與市場改革過程的制度化。根據大量的實際資料，就農民與都市居民的社會地位、個體與私營企業的發展等觀點，指出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並且分析人口狀況的特點，以及對人民提供社會庇護與保障國內社會政治安定的方法³⁴。

以俄國發展西伯利亞、遠東地區來對照中國與俄國接壤的東北、新疆和內蒙古地區等地的發展策略和規劃經驗，是相當有趣的。研究該議題的同時，亦探討俄國

³²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экономике Китая. М., 1997. (ИБ; № 12); Наумов И.Н. Стратег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НР в 1996-2020 гг. и проблемы ее реализации. М., 2001; Стратегия превращения Китая в супер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1996-2050) / Отв. ред. Титаренко М.Л. М., 2002; Экономика Китая вступает в XXI век / Общ. ред. и авт. предис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 М., 2004.

³³ Островский А.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рынка рабочей силы в КНР. М., 2002.

³⁴ Социаль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КНР в ходе реформ: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в ПДВ) // ГТДВ. 2002. № 5. С. 74-106; Социаль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ыночны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в КНР (1978-2002 гг.) / Отв. ред. Пивоварова Э.П. М., 2004.

與中國在跨區域互動的問題與遠景³⁵。

綜合研究中國農村從計畫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模式的過程。此外，也闡述此經濟模式在與人口、土地、糧食等問題密切相關的情況下，其正當性與特色，並分析中國農業轉型為市場導向的結果、問題與前景³⁶。

當前最重要的研究議題，乃是存在中國和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之間的「社會政治問題」。在此研究方向的論著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史料的系統化。從辛亥革命期間中國的第一屆國會，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與香港的現代議會，藉由這些資料反映中國代議機構的形成，以及其在各階段如何發揮作用，並說明當前這些權力結構的發展趨勢。

這些論著也研究奠定公民社會基礎的問題，以及中國在政治改革的發展上與各階段的特性。此外，分析共產黨在社會與經濟改革裏的角色和地位也相當重要，因此這些論著亦審視中共如何建立新的政治思想，其中包括多黨合作的機制、促進族群融合與團結各個社會階層的方針，並進而穩定政治局勢。此乃建立現代強國的可利條件。同時，以東南亞國家為借鑒，針對這個地區各國的民主改革進行比較³⁷。

二〇〇一年出版的專題論文《如何統治中國》(Как управляется Китай)，是由齊塔連柯主編，阿斯藍諾夫(Р. М. Асланов)、古達許尼科夫(Л. М. Гудошников)、葉梅里揚諾娃(Т. М. Емельянова)、伊凡諾娃(Н. И. Иванова)、寇喀列夫(К. А. Кокарев)、莫斯卡列夫(А. А. Москалев)、斯切潘諾娃(Г. А. Степанова)、敘托夫(А. В. Шитов)等人合撰。這是俄國漢學界首度以整體概念，分析中國的政黨與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等權力結構。書中針對中國大陸、兩個行政特區——香港、澳門，乃至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進行政治制度的比較，指出在一個國家領土上，同時存在著三種政體的獨特性，並預測北京當局基於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欲於近期內解

³⁵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М.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период реформ. М., 2005.

³⁶ Бонь Л.Д. Кита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на пути к рынку (1978-2004 гг.). М., 2005.

³⁷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в КНР. М., 2003 (ИМ. Сер. В. Вып. 14/15);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 2001; Асланов Р.М. Концепция «тре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 путь к социальному миру в Китае? // Китай в диалог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К 70-летию акад. М.И. Титаренко. М., 2004. С. 171-181; Ганшин В.Т. Китай и его соседи: на пути к гражданскому обществу. М., 2004.

決臺灣問題的相關政策發展³⁸。有一些論著則在探討行政特區（香港、澳門）的政治制度。特區如何「平穩地」與中國的全國制度整合為一，以及臺灣當局對內與對外政策等問題，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制訂的反分裂國家法來討論此議題³⁹。

在中國現代化意識型態的基本理論研究上已完成了不少著作。這些現代化意識型態，用來促進社會政治的穩定，並幫助因應不同時期需求的發展策略的修訂。例如，對中國而言在生態與環保政策的制訂是極為迫切的，檢視中國政府在這一範疇內政策形成的特點為何。這些著作分析了中國在加強政治、經濟、法律制度改革所產生的問題和民主化的過程，以及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事務上的參與⁴⁰。

根據大量的中國文獻，分析在「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和黨內、國內都相當知名的活動家彭德懷處於政治對立的史實，並研究毛澤東的晚年時期，以及他在位時對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影響⁴¹。

自遠東所創立以來，便持續研究中國國家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此研究方向的著名學者有拉赫莫夫 (Т. Р. Рахимов)、亞可夫列夫與波哥斯洛夫斯基 (В. А.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遠東所的聶羅諾夫 (Р. М. Неронов)、莫斯卡列夫、普茲茨基 (Е. В. Пузицкий)、拉札列娃 (Т. В. Лазарева) 等研究人員對地方民族自治提出了新的詮釋，諸如實踐民族自決，但不能從國家脫離的形式，並且針對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政治原則予以全面性的評價。莫斯卡列夫在二〇〇五年出版了一本專題論文，作者在書中解析中國自二十世紀初至今，意圖打造單一民族的計畫如何演變。還有，中共對待大漢民族主義與地方性（狹隘的）非漢族民族主義的態度，亦是書中分析民族主義問題時的切入點之一⁴²。

³⁸ Как управляется Китай: Эволюция властных структур в 80-90 гг. XX в. / Ред. Гитарско М.Л. М., 2001; То же. Как управляется Китай: Эволюция властных структур в XX -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2-е изд., доп. и обновл. М., 2004.

³⁹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Тайвань.: Справ.-аналит. материалы. Вып. 8. М., 2005; Кокарев 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механизм особых автономий Китая. М., 2004.

⁴⁰ Смирнов Д.А. Идеи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КНР: от Мао Дзэдуна к Дэн Сяопину. М., 2005; Бирюлин Е.В., Кранина Е.И.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КНР: опыт правов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М., 2005; Китай: новые горизонты реформ: (Материалы ежегод. конф. ЦСИП, янв. 2005.): В 2 ч. М., 2005.(ИМ. Сер. В. Вып. 19).

⁴¹ Галенович Ю.М. Пэн Дэхуай и Мао Цзэдун. М., 2005; Он же. Смерть Мао Цзэдуна. М., 2005.

⁴² Рахимов Т.Р.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этап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КНР // Треть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 М., 1978. Ч. 1. С. 32-35;

遠東所的學者們持續對「東亞精神文明」的種種問題進行有所裨益的研究。籌備出版五卷百科全書《中國精神文化大典》(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在世界漢學界是絕無僅有的。二〇〇六年在莫斯科出版第一卷《哲學》(Философия)，共計七二七頁，總結了中國的歷史哲學思想在俄國與海外的研究成果⁴³。

在一九九八年出版裴雷羅莫夫(Л. С. Переломов)的《孔子：論語的翻譯與研究》(Конфуций. Лунь юй: Перевод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一書中，除了俄文翻譯之外，也是俄國漢學界首次以學術觀點評論並注解這部中國社會思想的古老文獻。書中指出《論語》如何對日本、韓國、越南等文化產生影響。二〇〇三年孔子《中庸》⁴⁴的譯本與研究論文集問世，書中收錄了寇尼西(Д. Конисси)、布洛夫(В. Г. Буров)、陸齊揚諾夫與尤蓋(В. Б. Югай)的四種俄文譯本，更涵括了陸齊揚諾夫(頁95-178)旁徵博引的研究，並收入尤蓋的兩篇論文(頁179-247)。作者在文中以獨創的文本學方法論證這部文獻，內容豐富，獨樹一格。

費歐克契斯托夫(В. Ф. Феоктистов)的著作對於研究中國古典精神遺產有著相當卓越的貢獻，他在研究裏解析了古代中國傑出思想家荀子的觀點。其中一本是二〇〇五年出版的文集，書中翻譯並研究荀子的主要論著⁴⁵。作者亦省思在翻譯古代中國哲學文本的原則，以及中國哲學在二十一世紀的命運⁴⁶。

二〇〇四年出版了《孔子的四書》，由裴雷羅莫夫擔綱主編與導論寫作，寇布杰夫(А. И. Кобзев)、陸齊揚諾夫、裴雷羅莫夫、波波夫(П. С. Попов)和麥歐羅夫(В. М. Майоров)等人合力翻譯並加以評論。此乃俄國首度完整出版孔子所彙編的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А., Москалев А.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Китае (1911-1949). М., 1984; Вопрос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КНР (80-е годы) / Отв. ред. Неронов Р.М. М., 1993. (ИБ; № 1);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КНР ((1949-1994): В 2 ч. М., 1996. (ИБ; № 1, 2); Москалев А. А. Нация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Китае: Эволюция кит. мысли в подходах к нации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у. М., 2005.

⁴³ 本文截稿前，這套五卷的百科全書已經出版三本。除了第一卷《哲學》外，還有2007年在同一家出版社(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二卷《神話學與宗教》(Мифология. Религия)和2008年第三卷《文學、語言與文獻》(Литература. Язык 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⁴⁴ 此書由齊塔連柯、陸齊揚諾夫(А. Е. Лукьянов)主編。

⁴⁵ 此書由亞基莫娃(Е. В. Якимова)所策劃。

⁴⁶ Феоктистов В.Ф.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трактаты Сюнь-цз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еревод.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китаеведа. Изд. 2-е, доп. и испр. М., 2006.

禮教文本。二〇〇四年十月，俄國總統普欽參訪中國時，即是以此書作為官方贈禮，親手將書餽贈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許多綜合著作探討在東亞國家間跨文明對話的問題，闡述俄羅斯、西歐、中國、日本與韓國等文化之間相互交流的特性，呈現了文明散播的角色，其中也包含了國際關係裏宗教團體因素的作用⁴⁷。在東西文明互動的問題研究的框架下，學習不同歷史層面的中國精神文化，在研究著作裏闡述中國精神文明有如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並顯現出中國與西方文明在價值觀體系裏存在的共同與差異之處，呈現兩者共存的潛力，同時也預測兩者合作與衝突的可能性。二〇〇五年出版了由齊塔連柯主編的《易經》，一部奠定中國文化基礎，同時也是孔子彙編為「五經」之一的重要書籍。書中收錄了舒茨基(Ю. К. Щуцкий)對《占卜文本》的翻譯，以及陸齊揚諾夫對《十翼》的研究與翻譯。論文的研究探討《易經》在中國哲學裏的意義，以及它在中俄文化的原型上建立起雙方對談的可能性⁴⁸。

另外，由戈拉維娃(Д. Г. Главева)指導的哲學研討會不僅定期舉行，更將研討會的資料出版為兩冊的論文集《人類與東方精神文化》(Человек и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Востока)⁴⁹。研究傳統精神在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層面所扮演的角色亦不曾間斷。羅曼諾夫(А. В. Ломанов)分別在一九九六年以及一九九八年撰文出版了《當代新儒家：馮友蘭的哲學》(Современное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Философия Фэн Юлани)、《中國哲學傳統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命運：馮友蘭與其思維的轉變》(Судьбы ки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 Фэн Юлань и его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эволюция)⁵⁰。這是俄國漢學界首度研究馮友蘭——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中國思想家在人類學、認識論、本體論，以及社會歷史上的觀點。

⁴⁷ Ломанов А.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М., 2002; Кузнецов В.С. Будди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КНР. М., 2006.

⁴⁸ И цзин («Канон перемен»): Перевод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 Сост., пер. и исслед. Лукьянова А.Е.; Отв. ред. М.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2005.; Лукьянов А.Е. Война и мир цивилизаций // ПДВ. 2002. № 1. С. 151-165; № 2. С. 142-155; Он же.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 Народы Евразии: проблема межкультур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М., 2005. С. 73-105; Главева Д.Г.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япо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специфика мировосприятия. М., 2003.

⁴⁹ Человек и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Вып.1]. М., 2000. (ИБ; № 3); То же. Вып. 1-2. М., 2003.

⁵⁰ 《資訊公報》(ИБ)第一期(1998)。

庫茲涅佐夫分別在一九九六和二〇〇二年出版的論文與專書，〈中國政治史裏的伊斯蘭教〉(Ислам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與《伊斯蘭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政治生活》(Ислам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КНР)，還有在一九九八年出版戈布諾娃(С. А. Горбунова)的《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史》(Буддийски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в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XX в.)⁵¹，都是探討宗教在中國的發展情形，還有它如何影響中國社會的各個生活層面，以及古代與現代中國的對外政策。

本院出版了三本中國傑出詩人李白(701-762)的詩作，這是歐洲漢學界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地翻譯並研究李白的作品。此構想的發起人托洛普切夫(С. А. Торопцев)在這一系列李白的出版品中提供了俄文翻譯，並為其加入注釋與解釋。二〇〇二年為紀念李白一三〇〇年冥誕所出版的《太白之書》(Книга о Великой Белизне)，托洛普切夫在此書蒐羅了許多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俄羅斯對這位偉大的中國文人所做的研究。另一本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的《古風》，完整地翻譯了著名詩集《古風》的五十九首作品與注釋，並收錄了四篇分別由托洛普切夫、陸齊揚諾夫與中國學者郁賢皓和梁森針對詩作解析所寫的論文。二〇〇五年出版了《心靈之景：山水詩》(Пейзаж души: Поэзия гор и вод)，書中大量蒐集了以山水為主題的詩作的俄語新譯本，以及托洛普切夫、陸齊揚諾夫、梁森所寫的三篇論文⁵²。托洛普切夫與陸齊揚諾夫更延續此一主題，著手進行一部新而規模宏大的專著，研究這位偉大中國詩人的傳記。

中國傳統家庭演變的研究業已有本所學者關注，主要分析從遠古到十九世紀末，女性在家庭與社會的地位，闡明儒家傳統的決定性影響，並指出依據不同社會的、地域的特性之下，對待女性態度的差異為何⁵³。

已有研究分析了過去二十五年內中國政府在人民教育領域的策略，並細審推動行政管理、組織、經濟與其他教育管理的事務，以及全球趨勢對於制訂國家政策的影響⁵⁴。

⁵¹ 《資訊公報》第二期(1998)。

⁵² Книга о Великой Белизне. Ли Бо: поэзия и жизнь. М., 2002; Ли Бо. Дух старины. М., 2004; Ли Бо. Пейзаж души: Поэзия гор и вод. СПб., 2005.

⁵³ Усов В.П. Жены и наложницы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М., 2005.

⁵⁴ Боревская 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школа: опыт Китая на пороге III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М., 2003; Она же.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в Китае. М., 2002.

行文至此，上面所述只是簡要地檢視遠東所在近十年來的研究活動，以及學者們當前所解決的學術問題。遠東所學者每年平均生產約三十部論文、文集與年刊，《遠東問題》(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這本雜誌與遠東所的期刊也會刊載大量的資料，然而礙於篇幅限制，作者對著作無法被刊載的研究人員僅能事先表達歉意。

同時，必須強調的是，遠東所的研究活動並非僅止於出版論文抑或是印刷書刊。由遠東所所主持的六屆國際會議對學術研究進程的推動也具有重大貢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中國文明與世界：歷史、現代性與遠景」(Китай, кита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и мир: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這個會議的提綱與報告早在會議舉辦前就已經被多次發行(出版文件籌備組的負責人為阿司藍諾夫)。每年在俄國、獨立國協甚至是海外，都會舉辦近三十至四十場的學術會議。遠東所裏具領導地位的學者通常會積極參與，因此，這些會議便成為交換學術經驗並比較彼此觀點的平臺。

遠東所也與來自中國、日本、南北韓、越南、印度、美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等近四十個研究中心建立了「國際學術的交流與聯繫」，並透過該管道處理許多重要的學術議題。另外，在俄國，許多中央和地方的頂尖學術機構也都納入與中國合作的網絡。

遠東所的學術組織活動反映在其架構之完整，以求將研究潛力做更理性的應用：成立分掌八大方向的學術中心，以及三個學術組織部門等結構牢固的組織，以取代以往數量龐雜的部門和研究室。

然而，遠東所學術委員會的工作依舊占有重要地位，它負責決定學術研究的首要方向，確立學位論文的題材；就整體而論，它實際上也處理學術社群在當前與未來活動所面臨到的重大問題。光是自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五年僅僅九年的時間，學術委員會就舉辦了一百二十場以上的學術會議。

遠東所的两个論文委員會從不停息地運作著——在近十年內就進行了五十九個博士與副博士論文答辯，主要皆在探究遠東地區的歷史、政治、經濟問題。

遠東所的研究生班與博士班也培育新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所長辦公室與學術委員會在二〇〇二年通過決議：計劃在遠東所底下開設高等學府，以栽培區域研究的專才。二〇〇五年已獲准進行完善的教育事業。

若無相輔相成的資訊供應，則難以進行有效能的學術活動。對此，研究人員的

貢獻不容忽視。他們藉由俄通社——塔斯社與新華社定期更新的資訊建立電子資料庫，並評論海內外的期刊，甚至翻譯任何與遠東所研究的學術議題相關的中國與其他海外刊物，並製作摘要。近百臺的電腦使各個單位的學者與研究人員皆能登入資訊網。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的刊物資訊並非只能於網路瀏覽，更有廣大的讀者群是透過網路以外的管道取得——許多《資訊快遞》(Экспресс-информация)、《情報資料》(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的出版品皆會寄送至俄羅斯聯邦高層的行政與政府機構，而分送位址超過七十處。遠東所已於二〇〇五年架設了新網站⁵⁵。

廣為人知的文化資訊中心「中國」(中國廳)在遠東所與中俄友誼協會的資助下已運作多年。契訶文斯基院士會定期在中國廳舉辦研討會，在會議上一流的漢學專家廣泛探討當代中國的問題，以及中俄關係的現狀與發展。此外，由烏索夫(B. Н. Усов)主辦的演講機構也積極地發揮其效用，其演講多半是針對莘莘學子，以及對遠東民族和國家的過往今昔深感興趣的民眾。

如今，文化資訊中心「中國」已成為中俄友誼協會主要的活動平臺。多虧經驗豐富的漢學家，同時也是中俄友誼協會的第一任副代表庫立可娃(Г. В. Куликова)的大力推廣，該中心的啟蒙工作才得以逐年拓展。除此之外，她更藉由各種形式進行推廣活動，如發送論述中俄關係的報章雜誌、主持機智問答節目「你們認識中國嗎？」(Знаете ли вы Китай)與巡迴演講等。

中國廳會舉辦研討會、座談會，也會在中國歷史上的大日子籌備紀念活動，甚至是紀念人民解放運動的領導人與中國文化裏的名人。中國駐俄人員、中國僑民會的代表，以及中國學者代表團與中俄友誼協會都時常造訪該中心。

由於遠東所本身會購置藏書，加以中國友人於近日餽贈八百冊以上的書籍，使得遠東所圖書館和俄羅斯科學院社會科學情報研究所圖書館有如今的規模。遠東所的人員與聖彼得堡和遠東地區的漢學家亦會提供書籍以豐富館藏。

國家曾頒予遠東所的學者群崇高的獎項與頭銜，藉此認同其在俄國學術界，以及研究俄國在亞太地區政策的學術概念基礎的貢獻，並肯定本所維護俄國在遠東邊境的國家利益的重大功勞。其中契訶文斯基院士曾於一九九九年榮獲俄羅斯聯邦國家獎金，而俄羅斯科學院於創院滿二七五年以及其他紀念日時，也都曾獲頒勳章、獎牌與俄羅斯科學院榮譽證書。

⁵⁵ 網址是 www.ifes-ras.ru。